

## 第一章

# 生活與神話

弗蘭茨·卡夫卡(Franz Kafka)生平的基本情況比較平常，甚至毫無特色。他1883年7月3日出生於布拉格，其時他的父親赫爾曼·卡夫卡(Hermann Kafka)、母親尤莉·卡夫卡(Julie Kafka)在布拉格開了爿小店，賣些新奇物品、傘之類的東西。卡夫卡兄妹六個，他排行老大，兩個弟弟不幸幼年早夭，不過三個妹妹壽命都比他長。讀大學時他修讀法律，畢業後經過一年實習正式開始工作。他先就職於一家總部位於特里雅斯特的保險公司名下的地方分公司，一年後進入國立的工人事故保險事務所，工作職責包括處理工傷索賠事宜，還有察訪工廠，進行設備和安全措施檢查，以預防工傷事故的發生。空餘時間裏，他就寫些散文隨筆和故事在雜誌上發表；以1912年的《沉思錄》為開端，這些隨筆和短篇小說還以小書的形式出版。

1912年8月，卡夫卡與從柏林來訪的菲莉絲·鮑威爾(Felice Bauer)相識。菲莉絲比他小四歲，在柏林一家生產辦公設備的公司工作。他們的關係，包括兩次婚約，在很大程度上靠書信來維持(他們總共只見過

十七次面，最長的一次是在1916年7月，兩人在一家旅館待了十天)。最終，這段關係結束了。當時，卡夫卡在1917年8月體內大出血，後來查出是結核病所致；他只好到農村休養，自己也不知道還能活多久。後來的日子裏，短期工作和療養院休養先後交替，就這樣一直到他1922年提前退休。1919年，他和二十八歲的女職員沃律切克(Julie Wohryzek)有過短暫的婚約。但後來，卡夫卡又遇到已婚的密倫娜·波拉克(Milena Polak)(娘家姓耶申斯卡)，於是他和沃律切克的關係破裂了。波拉克是個活躍的記者，她的丈夫曾將卡夫卡的部分作品翻譯成捷克語，丈夫是個粗心人，因此和他在一起生活得不甚如意。由於密倫娜住在維也納，卡夫卡和她見面的次數很少，兩人的關係在1921年初結束。兩年後，卡夫卡最終離開了布拉格，和笛亞芒(Dora Diamant)——一個從極度正統的波蘭猶太家庭逃離出來的年輕女人——定居柏林。然而，卡夫卡的健康狀況急劇惡化，他輾轉於維也納附近的幾家診所和療養院之後，於1924年6月3日與世長辭。卡夫卡生前出版了七本小書，還留下了三部沒有完成的小說與大量的筆記和日記。卡夫卡曾經指示他的朋友布洛德(Max Brod)將這些筆記和日記銷毀，幸而布洛德沒有按他的意思執行，所以我們今天才得以看到它們。

卡夫卡的文化偶像地位，就是根據上述材料以某種方式製造出來的。這個神話般的卡夫卡，在彼得·

卡帕爾帝(Peter Capalid)的短片《弗蘭茨·卡夫卡的美好生活》(1994)中的病態隱士身上有典型體現。好不容易寫出了《變形記》的第一行，結果這個「K.先生」被吸引到聖誕慶典中，變得非常平易近人，甚至讓人家「就叫我F好了」。倍受折磨的卡夫卡之於20世紀(以及現在的21世紀)，猶如那個憂鬱的拜倫(Byron)之於19世紀。「卡夫卡式風格」，和曾經的「拜倫式風格」一樣，是個很有力的形容詞。但是，拜倫的形象是個險惡而性感的貴族，他鄙棄社會和宗教禁忌。卡夫卡的形象則與此形成對照：他是個民主的形象。卡夫卡的凡俗生平本身證明他是我們當中的一個：扎根於普通生活，因此經歷過或者想像過慣常的恐懼、痛苦和絕望，且達到了我們所有人都可以感同身受的程度，這個程度即使和我們的實際經驗不太相當，也和我們的種種憂慮乃至夢魘中的情形是相當的。

卡夫卡神話，就像拜倫神話一樣，是作者自己塑造的。其基礎即使不是作者的經歷，也是他思考、撰述自身經歷時塑造、闡述它們的方式。思考、撰述那些經歷，一則為了自己，再則為了大眾消費。兩種情況下，作者本人和他小說中的自我投射都很難分辨。拜倫的讀者把拜倫想像成他筆下主人公哈羅德(Childe Harold)和曼弗雷德<sup>\*</sup>(Manfred)那樣幻想破滅而

---

\* 恰爾德·哈羅德和曼弗雷德分別是拜倫的《恰爾德·哈羅德遊記》(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和《曼弗雷德》(Manfred)中的主人公。——



圖1 卡夫卡四歲。

憂悶的人。把卡夫卡和他小說中的主人公分開也一樣難，這些人物的名字被一步步壓縮〔如羅斯曼 (Karl Rossmann)，約瑟夫·K. (Josef K.)，到《城堡》僅剩一個字母K.〕。卡夫卡自己就曾碰到這個麻煩。1922年1月，他在一家山區旅館登記住宿時，發現裏面的工作人員因為看錯他的預訂記錄而把他的名字寫成了「Josef K[afka]」。「我是該讓他們糾正過來呢，還是讓他們把我糾正過來呢？」他在日記裏問道。

既然卡夫卡這個文化偶像從根本上是他自己塑造的，我們就沒有可能越過這個偶像去發掘出真正的卡夫卡。那個焦慮的日記作者、那個無休止地給鮑威爾和耶申斯卡 (Milena Jesenská) 寫着發於痛苦而又讓人痛苦的書信的人，和那個極有才幹的職業人士、那個熱心的業餘運動者、那個不時快意忘情於成功寫作中的小說家一樣，都是真實的卡夫卡。問題的關鍵不在於糾正卡夫卡的偶像形象，而是要回到卡夫卡的作品裏，去發現他如何將自身經歷和生活情境轉化成這個形象。與此同時，還有很多關於卡夫卡的事實性錯誤在流傳，其中有的可以追溯到早期傳記和回憶錄作者們的歪曲說法。只要對他的生平和所處的歷史背景做一個準確、全面的呈現，就可以修正那些歪曲的說法。但是，我們還是從卡夫卡其人開始。

卡夫卡是個很有自我分析精神的作家，有時候甚

---

本書注釋均由譯者所加，以下不再一一說明。

至沉迷於自我。他在日記和書信裏對自己的生活以及生活出了甚麼問題做了許多反思。他的小說創作則是較為間接地塑造、理解個人經歷的方式。1914年10月15日，他從工作中暫時停下來集中精力寫《審判》時，他記道：「這半個月的工作很棒，一定程度上對自身情況是個徹底的(!)認識。」雖然有無數的線索將他的經歷和他的小說聯繫起來，而且辨識這些線索確實也有一些價值，但是卡夫卡的作品和別人的作品一樣，不能歸結到那些可能的生平背景。正是因為卡夫卡的小說遠遠超越了其創作的起因，我們才不得不去注意卡夫卡。

### 《致父親的信》

要大致了解卡夫卡的個人經歷，並弄清他如何開始在反思的過程中將個人經歷寫進小說，我們不妨來看看他最長的一篇自我分析，即那封著名的《致父親的信》。這封信寫於1919年11月，卡夫卡在信裏分析了他和父親之間的關係。他原來似乎是打算將信寄給父親，希望能借此消除彼此的疑慮。但是他的妹妹奧特拉和母親——他顯然先把信給母親看了，後來還給妹妹看了——都勸他不要寄，於是他把信作為個人檔案保存起來。1920年，卡夫卡曾把信拿出來給密倫娜看，好幫她認識他。

這封信的首要意義在於它是個自我治療性的努

力。卡夫卡努力認識父子關係，以此來和父親劃清界線。由於這封信是卡夫卡為自身成長考慮有意而為，因而我們不能將它看成是對他父親赫爾曼·卡夫卡公允的或者完整的描繪。但是，也沒有理由認為信中的一切其實都是假的，信裏對他父親很強的個性還是做了比較合理的呈現。赫爾曼·卡夫卡白手起家，他在一個名叫沃賽克的南波希米亞村莊長大，生活極度貧困。七歲時就被迫推着小販車，到各個村子四處叫賣。年輕時的困苦給他留下了清晰的印象，後來他不斷地給孩子們講述那些困苦經歷，埋怨年輕一代意識不到他們的生活是多麼寬裕，惹得幾個孩子煞是心煩。赫爾曼不懈地工作，加上娶了富裕的啤酒坊主的女兒略維(Julie Löwy)為妻，從而得以在布拉格中心地區開了家店面。他身上自信的成份明顯多於感性。他教育卡夫卡的方式是粗魯的玩鬧(比如繞着桌子追他)和誇張的威脅——誇張得能把想像力豐富的小孩嚇壞(「我會像撕魚一樣撕了你!」)。卡夫卡追述了一個小事件：當時他還是個小孩，有天半夜裏把他父母哭醒了，結果父親把他從床上拎起來，放在他家房子後面的門廊上面，這讓卡夫卡覺得——起碼後來回想起來是——他和父親相比似乎甚麼都算不上。赫爾曼·卡夫卡用他兒子稱為「暴政」的方式管理家務和店務，批評孩子時重言諷傷，對僱工說話的樣子和說出來的話都很兇蠻。他用高壓手段對待僱工，一件事



圖2 卡夫卡的父親，赫爾曼·卡夫卡。

情就可以說明：有次所有僱工都辭了職，弗蘭茨得去一個個拜訪他們，勸他們回來。我們由此可以看到一幅一致的人物性格素描。按照今天的標準，人們對他在家裏和工作中的為人方式都不會有太高的評價。當然，有種東西卡夫卡沒有也無法傳達，那就是赫爾曼·卡夫卡肯定懷有的灰心沮喪感——因為人們不能遵從他所給出的明顯合理的指令，還因為他與自己的孩子之間有隔閡，尤其是與卡夫卡以及與不守常規的小女兒奧特拉(Ottla)之間有隔閡。對赫爾曼和尤莉·卡夫卡在他們唯一倖存下來的兒子(另兩個兒子分別在

十五個月和六個月時死去)身上所做的情感投資，弗蘭茨的信中也沒有表現出感激之情，這一點有助於說明父母何以對他感到失望。他們拿弗蘭茨年齡最長的堂兄布魯諾·卡夫卡(Bruno Kafka)作為成功的標準：布魯諾是位傑出的法學教授，後來成為著名的政界人物。可是，長大後的弗蘭茨志趣怪異，在職業上沒甚麼成就，也沒有明顯的能力娶妻成家。

按照卡夫卡自己的描述，他感到被他的父親壓制了。赫爾曼·卡夫卡龐大的身軀(對小孩來說肯定是巨大的)、大嗓門下的自信和絕對的權力，讓他看起來像個巨人。「單是您形體的存在就讓我有壓迫感。」卡夫卡寫道，同時回憶起一次他們在游泳場洗浴更衣時，他父親的龐大軀幹使他顯得像個「極小的骨架，站也站不穩，赤腳站在木板上，怕水，不會模仿您划水。」吃飯時，赫爾曼·卡夫卡狼吞虎咽，大口大口地，一點也不怕燙，把骨頭咬得嘎嘎響，卻禁止別人這麼做。(這裏我們可以發現卡夫卡小說中許多殘暴的食肉人物的由來，從《失蹤的人》\*中貪婪的格林到《絕食表演者》草稿中吃人肉的野人。)長大些後，卡夫卡發現他的身體長得太高太瘦，對自己瘦長的身材感到不舒服。與他父親相比，他對身體缺乏自信，這不過是他多方面不安全感的一部分。他的父親為成年

---

\* 布洛德後來將小說的標題換成了《美國》(America)。國內學界一般取布洛德的題目，翻譯成《美國》。

人的自信樹立了一個榜樣，而且永遠是無與倫比的。開始時，弗蘭茨在他面前說話吞吞吐吐，到最後盡量避免和他說話。他父親發號施令，自己卻不遵守那些命令。這樣一來，父親似乎行使着絕對的權力，而且該權力最終是以個人氣質為基礎的。由於赫爾曼·卡夫卡有這種力量，他可以不管前後是否一致或者是否符合邏輯，任意指斥所有人，而沒有人敢挑戰他。「我看您獲得了所有暴君所具有的神秘品質，這些暴君們的權力的基礎是他們本人而不是他們的思想。至少在我看來是如此。」他的父親似乎完全佔據了他，像一個人趴在世界地圖上似的，一點空間也不給弗蘭茨留下。卡夫卡無法模仿父親，只能怪自己無能。按照他自己的總結：「因為您，我喪失了自信，反過來，得到的卻是無盡的內疚感。」赫爾曼·卡夫卡統治得最穩固的地方是婚姻。他娶妻了，弗蘭茨卻沒有，但是大家希望他能娶上。成年的卡夫卡把這個處境解釋為一個進退兩難之境。

倘若我想在我倆之間不如意的關係中獲得獨立，就需要做點甚麼事情，而且這件事情與你幾乎沒有甚麼關係。結婚是最大的一件事，它讓我的獨立最為可靠，但是同時，它與你的關係也最密切了。

卡夫卡在這裏明確表達的，就是弗洛伊德所描述

的經典的俄狄浦斯式的父子關係。男性要長大成人，就必須長成他父親那樣性方面成熟的人；但是他又必須對抗父親，把他從家庭中唯一的或者說至高無上的性成熟的男性地位上拉下來。要勝過父親，他必須和父親對抗。可弗蘭茨又多了一個難處：據他自己稱，他小的時候對性沒有絲毫興趣，一有人提到性，他就會拘謹，有受冒犯的感覺；赫爾曼·卡夫卡則對性直言不諱。卡夫卡的父親曾暗示他應該去逛逛妓院，這對十多歲的弗蘭茨來說是「世界上最齷齪的事情」。所以，按照卡夫卡的說法，他自己要尋找配偶的願望受到了負面力量——軟弱、不安全感、內疚、缺乏自尊——的阻撓，而這些都是他父親輸入到他身上的。

按照卡夫卡自己說的，他用甚麼辦法才能避開父親的影響呢？一種可能就是找個職業。卡夫卡確實承認，他想學任何東西，他的父母都允許。（這可不是小事。讀大學意味着最少四年可以繼續住在家裏，不用掙錢，再過很長的時間以後他才可以掙足夠的錢來幫助父母或者自己獨立成家。）但是這裏的允許所隱含的自由，按照卡夫卡的說法，已經提前被否定了。因為他沉重的內疚感使他對學校學習提不起勁，他完全相信自己每年年終考試都不能通過，雖然實際上每次都通過了。他對學習的興趣很低，那程度（用他自己的話說）就像個欺騙了自己僱主的高級銀行職員在等着被人家查出來時，對日常交易業務還能保持的興趣那麼

大。所以，既然每個科目都吸引不了他，那就不妨學一門吧——法律，絕對讓他討厭的一門。「考試前的那幾個月，」卡夫卡痛苦地回憶道，「我的神經極度緊張，每天的精神食糧味同嚼蠟，況且那還是之前已經被千萬張嘴嚼過的蠟。」卡夫卡解釋自己何以選擇法律的原因顯得極其違反常情，有受虐狂的味道，不過對於任何一個沒有明確計劃或興趣的人，法律顯然是該選的大學課程，因為它為人們在法院、工業、商業、金融和公共服務等領域提供了廣泛的職業選擇。

要逃離赫爾曼的世界，一個明顯的出路似乎是文學。卡夫卡承認，寫作確實給他帶來些許解脫。但是，寫作並沒有帶來自由，因為他有甚麼可寫呢？「我所有的作品都是關於你的；只有在你的懷裏無法感傷的東西，我才到寫作裏感傷一番。」這當然是誇大其詞。強大厲害的父親確實在《判決》和《變形記》中出現了。一個咒罵自己的兒子，讓他去溺死算了；另一個扔蘋果砸他的兒子(其時已經變成甲蟲)，讓他受到致命的傷害。即便如此，創造此類半恐怖半荒誕的人物形象顯然是卡夫卡擺脫控制自身處境的方式。然而，在《致父親的信》中，卡夫卡把所有的作品都說成是另一種形式的依賴，雖然他沒有摘引具體段落為證。從生活逃入文學注定失敗，因為文學寫的必然是生活。

《致父親的信》在多大程度上是自我分析？信裏



圖3 讀大學時的卡夫卡同他在校時的情人之一——服務員漢茜·索科爾，約1906-1908年。

以高度戲劇化而又基本合理的方式呈現出作者的樣子：這個人的自尊，因為不太敏感的養育方式以及自感達不到父母的期望，受到了嚴重的傷害。當然，他如此強烈地感到自己的失敗，恰恰表明卡夫卡已經很深程度地接受、內化了父母的期待。他也感到應該結婚成個家，可是他有此希望是因為父母有此希望。卡夫卡敏銳地分辨出他在父子關係中所處的兩難境地。他指責父親冀望他娶妻結婚，卻把他的性格塑造得不能結婚。然而，他可能並不很清楚他的信在多大程度上表達、證明了這種兩難處境。寫信的目的也許是為了擺脫父親的影響，但是卡夫卡把自己描述成完完全全是他父親的產物，因此難以想像他還能夠逃脫他的父親。

在信中，母親的作用顯得小而又小，這可能會讓我們感到驚訝。她只是作為父親的助手出現，跟他太近，以至於不能為受其權威壓制的孩子們提供任何庇護；但是，她也是個不開心的中間人，受到丈夫和孩子們的壓迫。「我們殘忍地打擊她——你從你的方面，我們從我們的方面。」卡夫卡有兩個故事與他的家庭生活明顯有關：《審判》和《變形記》。其中，《審判》裏的母親死了，而《變形記》裏的母親雖然很關愛那個「不幸的兒子」，但是卻無能為力，關鍵時刻自己先昏倒了。然而，在心理分析者看來，卡夫卡感情脆弱不僅緣於父親的支配，還因為母親早就不再關愛他。卡夫卡的日記中顯示出尤莉·卡夫卡經常

因為古怪的兒子「嘆息啜泣」，讓他心煩，而且母親根本不能理解他；他埋怨母親把他當成一個普通的年輕人，認為他會暫時把各種奇怪念頭攔到一邊，像其他人那樣娶妻成家。卡夫卡寫給菲莉絲的一封信的「又及」裏記錄了一個感人的時刻，從中可以感受到他和母親之間的隔閡以及深藏的愛：

我正要脫衣的時候，母親因為有點小事進來了。她要出去時，吻我一下後道了聲晚安，這是多年以來都沒有過的。「就該這樣。」我說。「我從來不敢，」母親說，「我原來以為你不喜歡這樣。不過你喜歡的話，我也喜歡。」

這封《致父親的信》不可等閒視之。它裏面包含了大量的實際經歷和有見地的自我分析。但是，很大程度上，它講了個故事——就像卡夫卡講給自己聽的關於自己生活的故事。有一點無可辯駁：也許心理分析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東西，也不過是一個令人滿意的故事，講的就是我們何以變成現在的樣子。不過，這個故事顯示出《致父親的信》和自《失蹤的人》以來卡夫卡那些描述內疚的小說之間的關係。確實如此，我們可以看到卡夫卡用想像創造出一個堪比狡詐的銀行家的人，這聽起來像是另一部《審判》似的小說的萌芽。